

# 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

## ——宁波帮与近代宁波教育



郑元东 孙善根

2022年12月29日，由虞仁荣先生捐资建设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在汨汨东流的甬江之畔奠基，引发了人们对宁波帮捐资办学现象的关注。

宁波帮具有捐资兴学的传统。仅就宁波一地而言，近代特别是清末以后，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民间办学活动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且经久不衰，成为推动宁波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力量，并影响至今。

长期以来，宁波人以商著称于世，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商人抓住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上海崛起的历史机遇，奋发有为，发展成近代中国最大的地域性商人群体——宁波帮。事业成功后的宁波帮，家国情怀浓烈，纷纷投身于家乡慈善公益事业，特别是其办学活动可谓薪火相传。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办学形式与办学重点有所不同，办学规模也有所差异。

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举国震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此后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潮影响，宁波民间社会纷纷发起创办各类学校，有力地推动了宁波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捐资主体来看，有本地绅商，更多的则是旅外宁波帮；从办学形式来看，则以初级国民教育为主，也有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乃至传统义塾等，不一而足；从助学重点来看，以创办或资助各类学校为主，也有对师生的经济捐助等。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近

代著名宁波商人严信厚等协助宁波知府程云椒，创办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为宗旨的宁波储才学堂（宁波中学前身），成为宁波本地新式学校之始。

进入20世纪后，宁波商人捐资兴学之风益盛。如1908年，镇海旅沪商人谢衡德发起创办求精学堂。此后，谢氏又相继创办多所以“求精”为名的学校。到1947年，谢氏办学40年，在家乡独资创办学校10所，出资总额在国币50亿元以上。其间，甬上各大家族亦以协助当地办学为荣，竞相设立各类学校。仅镇海一地，清末就办起樊氏便蒙、董氏初初、叶氏中兴、洪氏尚志、方氏培玉、李氏养正、李氏敬德、虞氏述志、乌氏养中、陈氏思本等有影响的学堂。

1916年，慈溪商人秦润卿等，集资创办慈溪私立普迪小学，寓“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不仅学生就学免费，“教师只求安心教学，待遇从丰，全部经费由润老筹拨”。1925年，又建起普迪二校。盛时两校学生达2000人。1941年，慈溪县境沦陷，学校停办。抗战胜利后，两校恢复，需资浩大。无奈之下，秦润卿把自己身后抚恤金提前拨付应用，坚持办学到1952年上交国家。

上世纪30年代，宁波旅沪同乡会，发起创办四明大学并决定先办工、商、法三学院，后因战云密布，改为四明大学奖学金，以为四明大学之先声。后获奖者并不限于甬籍子弟，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张龙翔（浙江东阳籍）、宁波大学首任校长朱兆祥（镇海籍），都是四明大学奖学金获得者。

1937年7月，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旅外宁波商人也不例外。1941年4月宁波沦陷

长期在日本经商的吴锦堂，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教育立国有着深刻认识。他说，“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生存”。于是，慨叹故里之学校不兴，毅然引为己任，倾力创办锦堂学校。



锦堂学校创办人 吴锦堂

资料图片

后，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教育事业也遭受重大挫折。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宁波帮在家乡办学活动仍不绝如缕。

办学活动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事业，近代宁波帮家乡办学活动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在于得到了以新式知识分子与开明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社会的大力支持。可以说，近代商人与知识分子是推动宁波近代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两大力量，根源在于两者对教育的价值与意义高度认同。

首先，在工商实践中，宁波商人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而他们通过与外人的交往，又对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内在联系有深刻认知。如“五金大王”叶澄衷，经常与洋人打交

道，痛感早年失学之苦，表示“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以为“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为此，早在1872年，他即捐3万银元在家乡庄市创办叶氏义塾，惠及同族同乡子弟，后发展为镇海叶氏中心学校。当代享誉海内外的邵逸夫、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等宁波帮人士，早年都曾在此求学。

其次，具有一定教育程度，又主要在宁波本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本土知识分子或乡居绅商，大多认同“教育救国”与社会事业“先乡后国”的理念，具有改造地方社会的强烈愿望与乡土情结，而他们认为教育是建设家乡的最好途径。正是出于对教育于个人和地方发展乃至民族振兴价值的高度认同，加之造福家乡的桑梓情怀，使两者一拍即合，汇聚成重教兴学的强大力量。

近代中国长期贫困落后，风景这边独好的宁波近代教育得以发展与进步，无疑在于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民间办学活动的广泛开展。宁波帮办学活动，不仅有力弥补了地方教育财力的不足，而且积极推动全社会尊师重教风尚的形成，更为普及新式教育以及探索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正是在宁波帮的大力支持下，近代宁波教育事业相当发达，教学质量甚至不逊于许多大城市。许多后来在海内外卓有成就的宁波籍人物，包括邵逸夫、包玉刚、屠呦呦等，都是在家乡接受良好基础教育而后大步走向世界的。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

## 话说“莫着急”

### 随思录

陈鲁民

2022年最后一天，作家莫言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莫”式祝福：祝大家莫愁、莫熬夜、莫生气、莫着急！

在这“四莫”里，我对“莫着急”更有兴趣。有些事确实要急，不急就会错过时机，难以做成，是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有些事则不必那么着急，慢慢来就好，太急了会适得其反，急于求成，多事成败。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急也没用，反而会自乱阵脚，坏了心情。还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好。

成熟莫着急。成熟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到时间了自会翻然而至，你急什么？而且早熟未必是好事，早衰就紧跟在后面，“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

出名莫着急。炒作、造势、做假、出丑，都可以出名，但那名是虚的，如同五彩缤纷的肥皂泡，说破灭就破灭了。反之，只要你东西够了、成绩足了，自然会实至名归。

发财莫着急。一急可能就会想

着邪门歪道，挣的钱就不那么干净，花起来也不踏实，说不定还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像那些贪官污吏。

交友莫着急。一见面就称兄道弟，三杯酒下肚便要加微信好友，那种朋友多不靠谱。只有慢慢了解，相互知根知底，友谊才能稳固，朋友才能做得久远。

培养孩子莫着急。因为孩子天赋、性格、智商有差别，即使不在起跑线分高低，也会在终点线见输赢。家长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别看整天急得团团转，可能在做无用功。既然急也没用，那就不要太过焦虑，只要尽力就好。

还有，判案莫着急，先把证据找扎实了，免得办成冤假错案；跳槽莫着急，找好下家再说，免得鸡飞蛋打，两头落空；朋友圈转发消息莫着急，至少要搞清真假虚实，不要当谣言传播者。

再有，“阳了”莫着急，该吃药就吃药，该静养就静养，该送医就送医，既来之则安之。“阳康”后也莫着急去逛街、打球、狂欢，来日方长，不急于一时。

新的一年，有这个“莫着急”打底，纵然不会红红火火，至少也会稳稳当当。

### 漫画角



粉饰

王少华 绘



因由

田志仁 绘



一充再充

罗琪 绘



创办于1906年的镇海方氏培玉学校，在近代宁波城乡，如此精美的校舍并不少见。（资料图片）

### 世象管见

吴启钱

## 特别优待不如平等善待

疫情冲击尚未过去，“拼经济”已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基调。按以往的经验，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又将迎来被各地方政府给予各种优待或厚待的高光时刻。

企业和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给予他们优待或厚待，无可厚非。尤其是发挥着所谓“五六七八九”重大作用的民企，在当下困难时刻，被地方政府给予一些特别的政策优待，有利于全社会坚定发展的信心。不过，在地方财政吃紧的今天，要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民营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民企也会觉得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其实，撇开特殊时期的非常之举，对于真正的企业和着眼未来的企业家而言，特别优待都不如平等善待。

优待的本质是区别对待，表面说辞是，“四两拨千斤，不撒胡椒面”，操作手法是，将市场主体分为三六九等，并对少数企业给予特别照顾。也就是说，优待是一种厚待行为。

本来，在一个好的市场生态

下，对于有限资源的配置，遵循的是先来后到的原则、等价交换原则、价高者得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是，通过充分竞争，奖励罚懒，优胜劣汰，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市场因而繁荣兴旺，人们也能够互惠互利。这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样的机制，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更是温情的。

而优待或厚待的结果，则往往会损害公平，也损失效率。一方面，受优待的少数企业或少数企业家，一时间挺感激，可一旦其他地方推出更优惠的政策，免不了心猿意马，感恩与感激之情也抑制不了资本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资源硬约束条件下，厚此必薄彼，能获得优待的，永远是少数，而大量未获得优待的企业，感受到的是不平等的市场环境、营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能者也许会默念“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作“润”态，不能“润”者，有些则可能会通过寻租、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来获得活下去的本钱。

因此，正常市场和社会状

态下，除了为国家作出特殊贡献的英雄，除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极个别企业，没有人应该被特别优待。因为，对某人或某些企业的优待，就是对其他人和其他企业的不公。换言之，每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每一家遵纪守法的企业，都应该公平地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对待，没有例外，没有区别。这就叫善待。

善待，是一种平等对待。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必然需要平等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公民或市场主体，都是一个社会经济细胞，只有被平等对待，才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形成整个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对于公民来说，无论年龄、肤色、性别、种族、信仰、职业、家庭、贫富和强弱，在人格上、机会上和权利上完全平等，既不允许“强者通吃”，也不总是“弱者有理”。对于企业，则不分所有制性质，不管规模大小，无论与政府关系如何，都受平等对

待，都凭自己的本事去市场中分一杯羹，没有企业会被划入另册。如果不是这样，放任政治经济强权欺行霸市，必然违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善待，更是一种无“原罪”的对待，企业感受到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是时时处处被当作真正“自己人”的体贴。在正常社会，任何个体无需自证清白，因为他或她已经被法律和社会心理先天性地赋予了“正常”这款所有人共有的属性。如果让人天天自证没病，无论服务的口号喊得多响，优待也会被认为是施舍或赏赐，激发不出人们内心那种生而为人的高贵和自豪，所谓创造力也就无从谈起。

人很少会因被优待而真正心生感恩，但一定会因被善待而归心。因为，优待往往基于利益计算，善待则源于无功利的尊重。越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越要注意防止“一企一策”等应急行为对整体营商环境的损害，努力创造一个所有市场主体能被善待的发展环境。